

重点推荐

# 是倾听，也是对话

## ——关于张英的《文学仍然在场》和《只为内心写作》

□ 阎晶明

我并不确知张英的年龄，也没打听过他的出身和经历，从我认识他时，他好像总是保持着一样的体态、一样的表情，既不显得年轻，也不见慢慢变老。与他见面，总让人觉得他是刚刚从另一场合赶来，而且后面还有急活儿等着。他似乎总是在路上。但张英又给人一种可以沉静下来好好聊一聊的好感。他是一位好记者，而且特别懂文学。或者说，他就是带着浓厚的文学情结去做记者的。当然，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为了当好记者，完成好一篇访谈，他每每要下作家收集素材、构思作品，学者搜求资料、整理观点的功夫。而所有这些工作，又不会模糊他的记者身份，从未磨损他的职业敏感以及谈锋上的犀利。这样的文学记者真的不多。

日积月累，张英的作家访谈颇具规模，而且采访对象、访谈节奏、对谈风格十分相近甚至统一。现在，他要把这些作家访谈文章集成书，名曰《文学仍然在场》《只为内心写作》。凡称“课”者，势必是认为可以为人授业、解惑，张英的这本书是否也有这样的抱负和作用呢？我看过后的答案是：可以有！至少我自己读过后收获颇丰。

这是一次怀着对文学的敬意、对作家的真挚感情展开的对话之旅。长期以来，张英在北上广等不同城市间往来穿梭，在不同媒体上奋笔疾书。对活跃在中国当代文坛、创作上取得重要成就且为读者所熟知的著名作家进行访谈，是他在变动不居中坚持了20余年的事业。如今这些访谈集结成册，可谓洋洋大观，颇有阵势。这些访谈并非蜻蜓点水式的三段式提问，而是围绕一些重大的文学问题、作家曲折的人生经历、作品中的某个细节或某种风格展开深入探讨，能够激发作家的对话热情，将一次原本浅直的采访转变为一场容量极为丰富的围炉夜话。

为了达到这样的对话效果，张英不仅以自身的文学素养和文学梦想作为对话前提，

更要为每一场对话做充分的准备。他需要阅读访谈对象的几乎所有作品，熟知对方的人生经历，并且要对这些作品从思想到艺术、从内容到形式进行多方位的准确把握。他会与这些作家就某一部作品中引人关注、颇有争议的部分展开带有“对撞”意味的探讨。比如在与王蒙的访谈中，他们就其小说《这边风景》的创作历程、时代印迹、当代价值以及人物塑造、艺术风格等方面进行了深入讨论。与张英的对谈，是我读到的关于王蒙这部长篇小说最详尽的分析和论述。在与莫言展开的漫长谈话中，莫言各个时期创作的特点、重要作品的形成过程及自我评价，也都得到了充分阐述。

不仅如此，张英还同这些大作家们就文学阅读、文学经典的评价、文学影响的向度和选择等话题展开了深入讨论。比如，在与马原的对话中谈到了霍桑的《红字》和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与余华讨论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世界性影响；格非对世界文学范畴内“长河小说”（如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各部之间关系松散，甚至毫无关联”的特点进行了分析；迟子建则谈到了川端康成《雪国》里的一个细节，以此印证其在短篇小说创作中展现出的大师风范。这些讨论不仅丰富了内容维度，也为研究作家们的审美理念、阅读偏好、观察世界的方式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补充。这些信息即便对专业研究者和评论家而言，也是十分珍贵的一手资料。

这是一部具有问题意识、在尊重前提下展开平等对话的交流之书。在每一篇对谈中，张英始终保持明确的身份意识——他是来做访谈的，充分尊重访谈对象是前提，聚焦访谈对象个人的创作历程和文学观念是重点，激发他们分享文章之外的文学见解是策略。尊重访谈对象看似是一句简单的礼貌用语，实则蕴含丰富内涵。他必须熟知一位作家在创作上有哪些分期，风格上有哪些演



《文学仍然在场》《只为内心写作》，张英著，浙江文艺出版社，2025年3月

变，读者反馈尤其是评论家们有哪些关键性评价，等等。除了掌握这些信息，张英还要求自己做到：一定要有独立观点，绝不做“为什么写这个”“今后还有什么打算”这类人云亦云式的提问者。但同时，也要避免以专家自居，杜绝成为仿佛掌握了不可更改的创作原理，或自认为可以代表所有读者进行诘问的自负之人。

这样的分寸拿捏起来并不容易。我所说的“拿捏”，并非访谈时临时摆出的某种姿态，而是由深厚文学素养和阅读积淀所造就的既自信又谦逊的状态。这种状态既能充分激发访谈对象的谈话热情，又不会让自己沦为试图与对方平起平坐、据理力争的“抢戏”者。这恰恰体现了一个成熟新闻采访者、老练媒体访谈人应有的职业素养。张英以往以亲切的方式与对方展开漫谈，用“引诱”的技巧让对方吐露平常未必会透露的心声。有时，他还会抛出一个恰到好处的问

题，让对方直面那些需要澄清或深入探讨的关键问题。

做到这一点着实不易，张英自有其独特的技巧与方法。在这些访谈中，我们不难发现，众多读者关注、网络热议、评论界争论的热点与敏感话题频频出现，不仅吸引了读者目光，还引发了人们对创作与文学的深入思考。这种自觉的问题意识与高超的访谈技巧，正是这部书极为重要的价值所在。比如在与王蒙的对话中，张英适时发问：“‘这边风景’荣获茅盾文学奖，我读了这部作品，它讲述的是1960年新疆伊犁一个维吾尔村庄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背景下的故事，令人十分吃惊。它完全是《金光大道》《创业史》《红旗谱》那种歌颂集体、人民公社、合作化的作品类型。您为何选择在30年后才出版这部小说？”由此，王蒙展开了令人信服的长篇解析。可以说，没有尖锐深刻的问题，就难有富有内涵的应答。

在同金庸的访谈中，张英发挥了自己深入阅读的优势，就武侠小说的理论问题与金庸的创作理念展开了专业性极强的探讨。他还援引学者严家炎的观点进行提问，从而让读者了解到，原来金庸“写《倚天屠龙记》的时候，和鲁迅的《铸剑》存在一点关联，某种程度上将鲁迅的思想融入其中”。在与陈忠实讨论《白鹿原》时，张英提出“有人称这部作品为‘笔记县志体’小说，您对此有何看法”，以及《白鹿原》以“修订本”得奖等问题，促使一向谦和的陈忠实慷慨激昂地表达了自己独立的见解与坚持。针对舆论热议的某些说法，张英向莫言求证，使其道出“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的无奈；向余华指出“如今很多人不理解您”的现实，促使余华阐述自己的创作理念与抱负追求。所有这些访谈，让人读来既觉熟悉又感新鲜，既有现场即兴讨论的热烈氛围，又不失作家成熟的创作思考。

总之，张英与20多位当代作家展开的这些访谈，构成了一次漫长的文学对话。对读者来说，阅读这些访谈，无疑是一堂收获满满的文学课，而且内容生动精彩。对专业的文学评论者而言，书中大量独特的观点和可信的资料也颇具留存价值。

张英依旧行进在文学与新闻的双轨之路上，他的文字依然值得期待！（作者系中国作协副主席）

书人絮语

在长沙获赠龚曙光的新著《样范》，读其中的篇什，如他描述蔡测海、韩少功、何立伟的文字，瞬间将我带入不同年代的记忆中。这是与青春和文学有关的记忆，非隔窗听雨，而是置身于难以忘怀的风雨路途。读毕全书，记忆如群岭绵延，风雨止息，视野一派清朗。曙光窈窕的文字，如还乡的群鸟翅膀灵动，可闻透彻的啼鸣。我想，《样范》这本书，不仅仅是属于曙光一个人的“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它更是属于文学的。

阅读作家与作家相交的作品，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视角。我与蔡测海相识于1986年秋，当时他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我供职于《青年文学》杂志社。此前4年，他的小说《远去的伐木声》获全国优秀小说奖。那个年代的文学与今天的文学已无可比性，说样范不同，恐怕不会存在异议。那时，《青年文学》先后编发了铁凝的《哦，香雪》、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宋学武的《小草》等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小说，可谓星光闪耀。《青年文学》还编发了“湖南青年作家作品专号”，其中有韩少功、蔡测海、何立伟、王平、蒋子丹等作家的优秀作品。

1993年，我与少功相识于海南，那时我们都年轻，海南的经济大潮让我们隐隐地感觉到文学如岛屿，在巨大的变革中时隐时现。3年后，他的长篇小说《马桥词典》出版。1999年，在海南工作7年后，我重返北京，重归文学之梦。

还是在海口的时候，我曾兼职编辑一本企业文化内刊，在3年时间里，我给何立伟开设了一个漫画专栏，他的漫画蕴含冷幽默，看了让人忍俊不禁，又发人深思。见面时，我们习惯于尊称他为伟哥，他总是戴着标志性的帽子，帽檐下是一双仿佛洞悉了一切的眼睛，你会看见智慧之光里也有顽皮和狡计，但又不能怀疑他的诚挚。

可以说，曙光笔下的诸位都是活灵活现的人物，这是历经岁月濯洗的友谊，沉淀如金、清晰如釉、散淡如云、醇厚如酒。我每次回长沙，都要和蔡测海小聚，面对他，我总会想到20世纪80年代的北京，那时的他风流倜傥、疾步如风、热情似火。如今，据测海说，他的一只耳朵失聪了。他总是问，你说什么？有时，几个朋友小聚，我有意揭他一个短处，他就听到了，立即说“不是这样的”。我也曾问他，你是不是选择性失聪？测海说“不是这样的”。描写蔡测海，曙光的标题是《蔡哥或者蔡文豪》，真是准确无误。可是，在39年前，测海的背影不是如曙光所写那般“硕大”的，形容那时的蔡测海玉树临风也不过为，那时他也不是光头，他的满头黑发也相当具有魅感性。

曙光曾长期在出版界就职，可以说练就了火眼金睛，他能敏感地捕捉到一个作家和他作品的闪光点，也就是独特性。他的《样范》中的文字是真实洗练的，他集合了自己的发现，这是一本具有作家人物传记性质的著述，将一个群体定格在时间和细节里。曙光在有意识的写作中，无意识地把一些珍贵的东西复活了。我从中看出了曙光的厚重和内敛，他的写作不是肆意的，他像一个诗人那样一个意象、一个意象地建筑起与人相关的精神屋宇，感觉他始终在微笑着，和朋友们叙旧，品着新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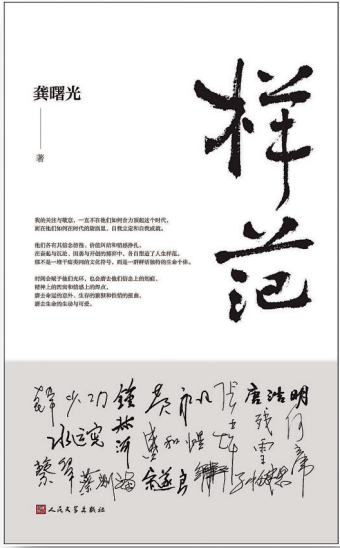
“样范”是一个具有地域特色的名词，它的引申词义丰富，也很形象。我因移居长沙近十年，能懂曙光的用心。世间尘埃起落，我们总要留住些什么，铭记些什么。说往昔珍贵，是因为一些富有真知灼见的人用他们的思想创造出许多珍贵的东西来。未来，如果那些懂得选择的人们再读韩少功的《西望茅草地》《飞过蓝天》，读蔡测海的《母船》《父亲简史》，读何立伟的《白色鸟》，读唐浩明的《曾国藩》，等等，他们就可以看到“样范”。一定会有人说，过去还有这么多值得阅读的人和作品。这或许是曙光写作《样范》的初衷。

在《样范》文尾，曙光提及了两位文学大家，一位是王蒙，一个写作了《青春万岁》（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布礼》《活动变人形》的作家；另一位是白先勇，一个写作了《生死恋》《台北人》《纽约客》《游园惊梦》的作家。实际上，在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上，文学是存在着承袭传统的，曙光描述和表达的是对这种悠久传统的致意和尊重。（作者系诗人）

向悠久的文学传统致意

——读龚曙光的《样范》

□ 舒洁



《样范》，龚曙光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4年4月

# 《这一凿，生命如花》：消费时代的文化拼图

□ 周明全

嵌入精神血脉之中。由此我们看到，非遗并不是通过一个匠人的技艺和地域因素构想出来的，而是基于社会心理构成、历史乃至非遗自身有关的一切所决定的。《盛开在民间沃土之上》中的“锣鼓书”、《脱胎换骨的转化》中的“烧窑”，均探讨了在“无土时代”，随着“文化复古”之风兴起，民间非遗的活化与转化问题。从这些片段化的生存场景中，我们既能看到传统生活里温馨的人伦与充实的劳作，也能感受到从前现代农耕文明向现代社会过渡时的“自为”与“自得”，这体现了刘香河慕古却不泥古的创作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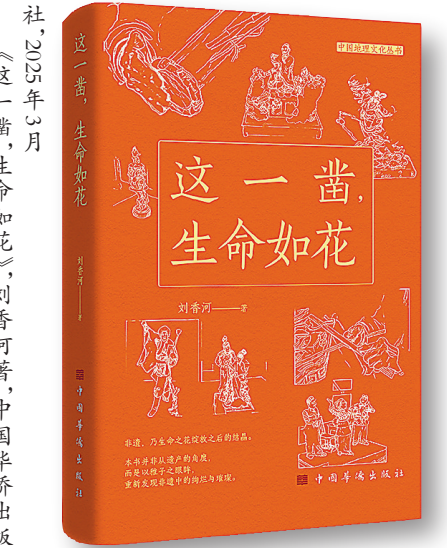
非遗并非遗落之物，而是深深扎根于充满烟火气的日常空间，让我们一次次领略热烈的生命情怀。在《在旧时光里沉潜》一文中，我们既能看到会船、庙会、说鸽子等令作家痴迷的地方风俗，也能读到水乡日常中蕴含的诗学与美学内涵，尽显百态风情。当这些鲜活丰富的日常场景扑面而来，我们获得了一种基于地理与空间维度的审美体验。这些散文既保留了具有历史纵深的文化原乡印记，又承载了多元的审美信息，搭建起作家与世界交流的桥梁。这或许就是我们在读刘香河散文时，既感受到在历史与当下穿梭的眩暈感，又产生深切共鸣的原因所在。

《舞出生命中的汪洋恣肆》中的“打莲湘”与“千户狮子舞”，《唤醒儿时的味蕾》中的泰州嵌桃麻糕和姜堰薄脆，还有《这一凿，

生命如花》中的“石雕”与“木雕”等等，无不展现出普通人的生命理想和诗性情怀，也凸显了日常生活中的精神自足性。尽管作家的笔墨集中于某个对象，但字里行间却是那些难以释怀的情感，以及现代人对文化家园的精神渴求。由此可见，尽管非遗不可避免地经历了历史与当下的重构，但它依然持续构建出不断变化的参照框架，传统在这一框架中被不断重新组织。在此意义上，刘香河既直面非遗的“现场”，也在寻找赋予其“有机身份”的途径。因为只有当非遗获得当代人的认同，并融入当代生活，其内在精神的当代性被发掘出来，才能从流行文化的包围中突围而出。我认为，刘香河的散文中潜藏着某种对话关系：既与传统的连续性和承继性展开对话，也与以消费文化为代表的当代流行文化进行对话，试图将人们从“欲望的迷途与甜俗的虚幻中唤醒”。

或许，刘香河这些非遗散文写作的意义就在于，经由非遗重申文化机制的调节作用。当我们与非遗的距离似乎越来越远时，更需要与它展开某种内在的对话与交流，凭借天然情感、文化习俗、传统习惯等，构建一种缄默共存的交往关系。唯此，我们才能学会在瞬息万变的当下发掘精神的宝藏，拥有更为宽广而澄明的生活空间。

（作者系《大家》杂志主编、中国现代文学馆特约研究员）



视角呈现出来，并非易事，这不仅知识的再造，也是一种空间的生产，它既对应于每个非遗对象外在的技艺经验结构，同时，也内在于社会空间的结构之中。

正因如此，刘香河没有采取批判性的视角，而是选择了立体的人类学的视角，我们或可发现，刘香河笔下的这些非遗对象，并没有局限于一时一地，也即是说，他所采用的并不仅仅是一个时空性的角度，而是包含了周围的印象、影响与观念构成的整体观感。《拆除藩篱，让生命信马由缰》虽重点落笔于泰兴花鼓，却先后比较了安塞腰鼓、苗族芦笙舞、孔雀舞等民间舞蹈形式，从中得以窥得此类非遗的整体风貌。《妙手生花》中的“泥塑”与“吹糖人”，其实并非仅写下河所有，但是，在刘香河笔下，这些非遗技艺推己及人，让其以特有的文化景观的方式，深深

我创作《中国往事·侠之大者》的灵感源于我的姥爷。姥爷曾是一名军人，他不善言辞，向来做得多说得少。他们生活的年代，物质远不如现在丰富。和许多长辈一样，姥爷家里的洗手池旁总放着接水的小盒；为了省下几毛钱，他买菜时会多骑几公里路；下雪天，他主动在大院里清理全院的积雪；他还热心地帮邻里街坊修理各种电器……80岁后，姥爷终于闲下来，即便住住院期间，他也要求我们随手关灯，甚至洗手用香皂的短暂一分钟，都要关上水龙头。姥爷说，这是为国家省水。他们那一代人，总是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紧密相连。听姥爷讲述往事，仿佛能回望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历程。

很多男孩小时候都有当兵梦、飞天梦，而我曾怀揣警察梦。3岁那年，我和奶奶在公园里走散，是街上巡逻的警察叔叔送我回了家。中学时，我前往青海一个山村小学做公益，和警院的大学生志愿者小张哥哥同住一个房间。他给我讲了许多警校的趣事。小张哥哥身高一米九多，身姿挺拔，精气神十足。我发自内心地认同他常挂在嘴边的“要做有意义的事”“要报效祖国”这些话，因为他无论何时都站有站姿、坐有坐相，说话时坚

创作谈

# 记录那些平凡又伟大的故事

□ 刘汉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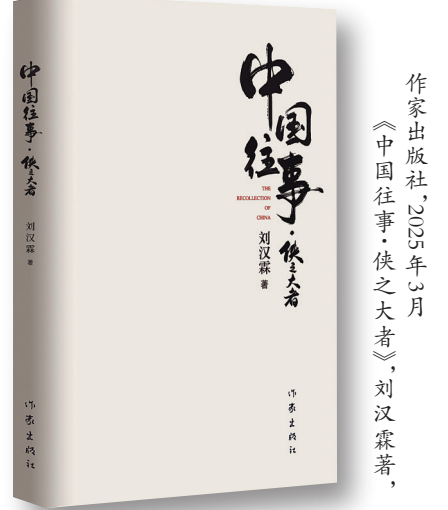
定的眼神、真诚的语气，总能感染身边的每一个人。小张毕业后成了一名特警。他告诉我，每年校庆时，许多毕业班都凑不齐人。我懵懂地问：“警察真是辛苦啊，是不是都在外出执行任务？”他愣了一下，我这才知道，那些所谓“凑不齐”的警察，是已经牺牲了。

到高中时，我的梦想从最初想考警校当刑警，变成了想拍电影，讲述警察的故事。大学毕业后，我开始创作与警察相关的内容。在我看来，中国警察的过往经历，也是视角独特的中国故事；警察故事与社会民生、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紧密相连。我认识的那些担任志愿者的刑警专家，都和姥爷一样信念坚定、逻辑缜密，身上散发着坚韧、豪迈、洒脱且无所畏惧的独特魅力，我认为真

正的男子汉就该如此。他们平凡又伟大的故事，需要通过文学、影视作品记录下来。

写警察小说对我来说困难重重。在此之前，我从未写过小说，而小说与影视剧本的写法又截然不同。此外，在采访过程中我发现，英勇无畏的刑警们面对镜头往往会紧张害羞，谈及自己时总是一笔带过。因此，想要挖掘出好故事，就需要像抽丝剥茧般深入“破案”。

记得有一位刑警向我讲述一次追逃行动，当时面对持枪歹徒，他和战友决定趁深夜踹门抓捕。一旦嫌疑人警觉，极有可能引发枪战，甚至造成人员伤亡。踹门前的压力可想而知，但他却只是轻描淡写地描述：“那天也不知道怎么了，平时踹门都很熟练，那天踹了三次才把门踹



开。”还有一位刑警回忆起某次枪战时的场景，当时歹徒持有冲锋枪、手榴弹等重型武器。我追问他当时的心理活动，问他是否害怕，他回答道：“当时不害怕，事后才觉得后怕。当时就想着隔着玻璃对方不一定能打中我，就算打中了，也

未必会击中要害。”他们说得云淡风轻，我却听得心惊肉跳。

随着采访的深入，我发现每位刑警都个性鲜明，无论职位高低，他们身上又有着许多共性。为真实还原刑警这个群体的特性，我对许多刑警专家志愿者的个性进行了提炼与重组、艺术化塑造。例如李国安是一位技术性刑侦专家，他像许多男孩一样，被刑警职业的魅力所吸引。他身上集中体现了众多一线刑警执着坚韧、吃苦耐劳、默默无闻、甘于奉献的特质，其成长轨迹符合这个群体的发展逻辑。而刘国栋大队长、杨德众局长身处刑侦领导岗位，他们不再局限于个案处理思维，而是着眼于通过健全体制来遏制犯罪，致力于构建长效机制、培育专业队伍，为社会长治久安和国家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聆听刑警们讲述故事时，我常常忍不住想落泪。这群伴随着中国发展历程一路走来的人民警察，将守护人民幸福、维护国家安宁作为奋斗目标，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始终无怨无悔地坚守岗位。谨以此书，致敬和平年代牺牲最多、奉献最大的人民公安！（作者系青年作家、编剧）